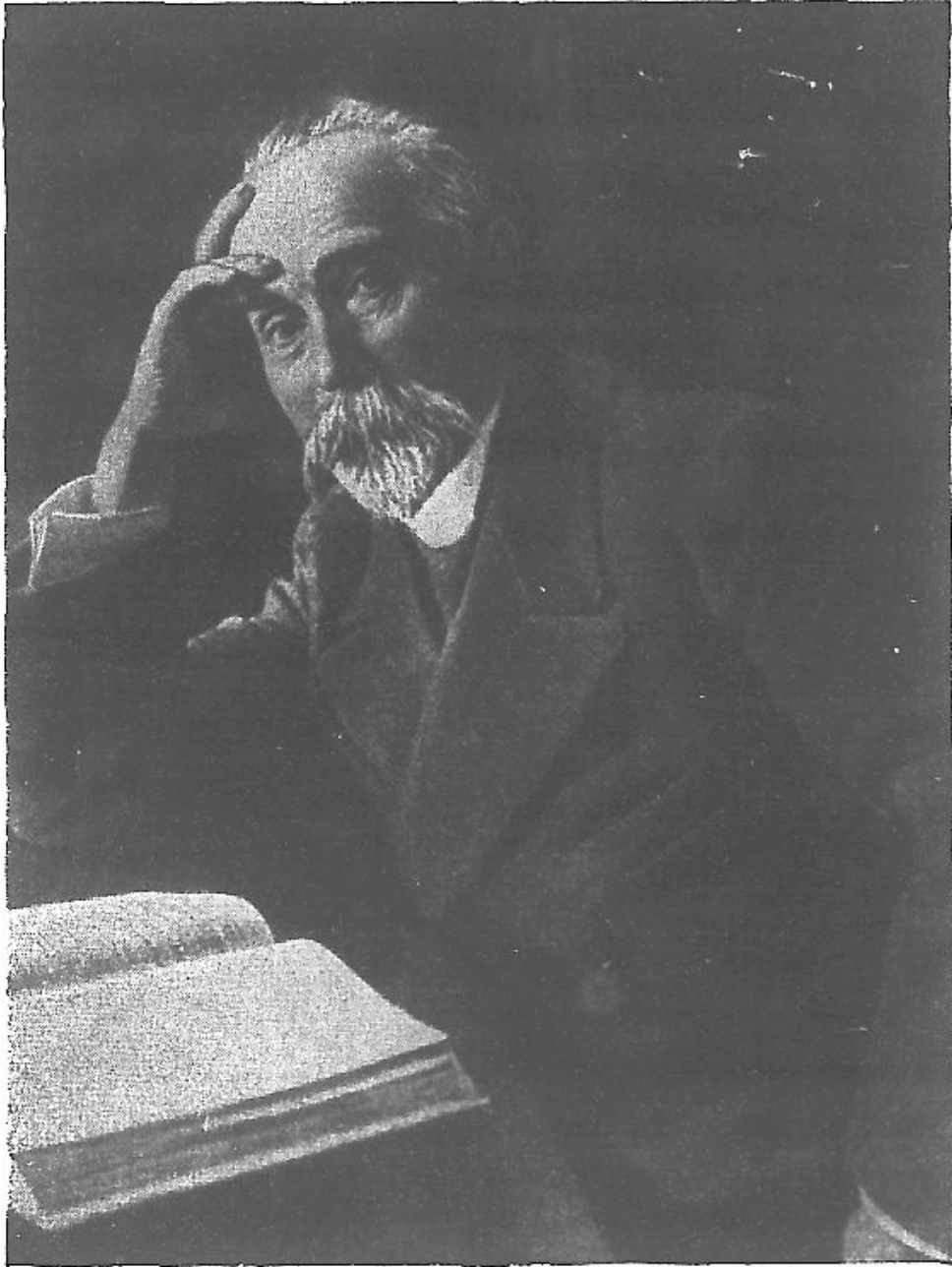


論個人歷史的作用





T. H. Уелландер.

602.45
160-5
2

普列漢諾夫著

論個人歷史的作用



3 0647 0660 3



外國文書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八年八月

校譯眞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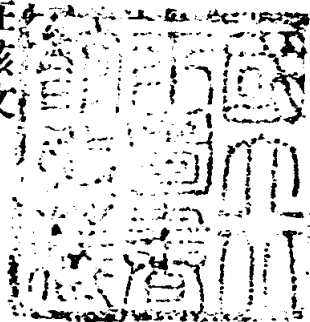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明聲底局版出

的 上 史 歷 在 人 個 論 著 所 夫 諾 漢 列 普
用次初年八九八一於是，書一用作
治攻立國聯蘇按係版本。印刊文俄
。出譯本版年四四九一局版出籍書

(一)

已故的卡布里茨(註一)在七十年代後半期寫了理性與情感是進步的因素一文。在該文中，作者援引斯賓塞底言論，認為在人類前進運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性只起着次要的並且完全是附屬的作用。有位「可敬的社會學家」(註二)反駁卡布里茨時，對這種輕視理性的理論表示含有譏嘲意味的驚異。這位「可敬的社會學家」為理性作辯護，當然是作得正確的。但他如果不涉及卡布里茨所提出的那個問題底實質，而單只指明根本不可以和不容許這樣提出問題，那他就會作得更為正確了。須知，「因素」論本來就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它竟把社會生活中某幾方面隨便提了出來，將其看作獨立的實體，將其看作是從各個不同方面和具着程度不同的功效引導社會人類走向進步的力量。尤其因為卡布里茨把它敘述成這樣，以至不是把社會人類活動底某些部分，而是把個人意識底某些部分說成爲社會學上的特別主體，於是這個理論就顯得更加荒謬了。這真是絕頂的抽象；無法再往前進一步，因為再進一步，就會走進顯然妄誕無理，滑稽可笑的境界。這才是「可敬的社會學家」應該叫卡布里茨及其讀者們注意的地方。「可敬的社會學家」看出卡布里茨因極力探尋歷史上統治「因素」而走進了怎樣一種抽象的迷宮時，也許會對因素論本身偶然作出一點批評的。這樣來作，當時對於我們大家都會



是很有益處的。但他却沒有勝任。原來他自己也是站在這一理論底觀點上，其與卡布里茨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他具有折衷主義的傾向，所以他竟覺得一切「因素」都是同樣重要的。後來，在他攻擊辯證唯物主義的言論中，他那副頭腦底折衷主義本性更是表現得特別明顯，竟以為辯證唯物主義是爲了經濟「因素」而犧牲其他一切「因素」，並把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化爲烏有的一種學說。「可敬的社會學家」連想都沒有想到辯證唯物主義絕對排斥「因素」說，所以只有完全不能按邏輯思維的人才會認爲辯證唯物主義是替所謂無爲主義作辯護的學說。不過，應該指出，「可敬的社會學家」所犯的這個錯誤絲毫也不新奇：過去有，現在有，並且大概將來很久一個時期也還會有許多人犯這種錯誤：

當唯物主義者還沒有擬定出辯證法的自然和歷史觀的時候，早已就有人責備他們傾向於「無爲主義」了。我們且不去追溯「往古」，只要指出英國一位著名學者普里斯特萊同普萊斯進行的爭論。普萊斯批判普里斯特萊學說時，硬說唯物主義與自由觀念不能相容，硬說唯物主義根本否認個人底積極作用。當時普列斯特萊曾援引日常經驗來反駁過他。「我不來講我自己，雖然誰也不能說我是個最不活動的動物（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但我要問問你：究竟還有什麼人比必然論者更富於努力追求最主要目標的思考力，積極性，力量和堅忍不拔精神呢？」普里斯特萊說這話時，是

指宗教民主派，即指當時所謂 *christian necessarians* * 而言。我們不知道這個教派是否真像該派份子普里斯特萊所想像的那樣積極。但這點並不重要。毫無疑義，唯物主義的人類意志觀是完全能與最堅毅積極的實際行為相容的。郎松(註三)說道，「所有一切向人類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學說，都在原則上認定意志沒有力量，都否認自由而硬要世界服從宿命論」**。

郎松以為凡屬否認所謂意志自由的觀點都會走到宿命論，他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然而他終究指出了一件極值得注意的歷史事實：其實歷史告訴我們，甚至宿命論也不僅不總是妨礙堅毅實際行動，而且相反，在某些時代，宿命論還是這種行動底心理上的一種必要基礎。例如在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比其他一切黨派都表現過更大的毅力，又如謨罕默德信徒在很短一個時期內就征服了從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廣大地域。誰若認為我們祇要一確信某些事變必然到來，則我們在心理上就不復能促進或阻撓這些事變的到來，那他就未免想錯了***。

* 十八世紀的法國人看見唯物主義與宗教信條這樣配合起來，一定會深為驚訝。但在英國却沒有一個人覺得這種現象奇怪。普里斯特萊本人就是一個非常信奉宗教的人。真是各地有各地的風俗。

** 參看法國文學史註本，第一卷，第五一一頁。

*** 大家知道，依據加爾文學說，人底一切行為都是由上帝預定了的。Prædestinationem vocamus æ-

這裏一切都要依我自己的活動是否爲必然事變鎖鍊中必要的一環爲轉移。如果「是」的話，那我的猶豫就會更少，我的動作也就會更加堅決。這是毫不足怪的：當我們說某人認爲自己的活動是必然事變鎖鍊中必要的一環的時候，那就是說，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看來是等於完全不能無所動作，這種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的意識中所引起的反映是認爲不能不如他所作的那樣去作。這便是可以用路德底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來表示的一種心理，人們具有這種心理，就會表現出簡直不可遏止的毅力，作出絕頂驚人的功業。哈姆列特根本沒有這種心理，所以他始終只能呻吟叫苦，只能反省直覺。因此，哈姆列特也就始終忍耐不了那認爲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學。費希特說得對：「有怎樣一個人，也就會有怎樣一種哲學」。

ternum Dei decretum, quo apud se constitutum habuit, quod de uno quoque homine fieri valet.（「我們所謂預定，是指上帝底意旨而言，上帝憑其意旨所規定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對各個人發生效力的」。——譯者）。（*Institutio, lib. III, cap. 5.*）。同時，依據這個學說，上帝從他的侍衆中挑選出幾個人去解救那些受無理壓迫的人民。救出猶太人的那個莫依斯就是這樣的人物。克倫威爾大概也自認爲是上帝底這種工具；他始終，並且想必是很誠摯地稱自己的行動爲上帝意旨底產物。他自己認爲所有這一切行動都是預先決定了的必然的結果。但這不僅沒有妨礙他趨向於一勝再勝，並且還使他這種趨向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我既站在這個地位上，也就不免要這樣作」。——譯者。

(二)

我國有些人聽信了史達木萊爾(註四)底意見，以為西歐有一種社會政治學說似乎含有不可解決的矛盾。我們所指的就是關於月蝕的那個有名的例子。其實這個例子是再無聊沒有了。在月蝕所必需的種種條件中，人底活動無論如何也不包括在內，並且也不能包括在內。單就這點來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瘋人院裏才能產生出一個促成月蝕的政黨。退一步說，就假定人類的活動能包括在上述條件中去，但凡屬很想看見月蝕而又確信這種現象不用他們幫助也必然會發生的人終究是不會加入月蝕黨的。在這種場合，他們的「無爲主義」就會只是拒絕去作無謂的事情，即是拒絕去幹無益的動作，而與真正的無爲主義毫不相干。爲了使這個月蝕例子不是一種毫無意思的事情，那末月蝕黨就得把這個例子完全改變過來。那時就要設想月亮是個有意識的東西，認爲月亮覺得它受蝕時在天空中所佔的位置是其意志自決的結果，這個位置不僅使它感到極大的快樂，並且是爲使它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絕對必需的，因此它總是力求站在這個位置上*。這樣設想以後，就會要自問一下：當月亮終究發覺原來並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

* «C'est com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pla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決定它在天空中的運動，反而是它的運動決定它的意志及其「理想」的時候，那它又會作何感想呢。照史達木萊爾底意見說來，當月亮一發覺這點時，那它除非用某種邏輯上的矛盾想法來解脫這種窘境，就會不能運動了。但這種假定是毫無根據的。這樣一種發覺，也許會成爲使月亮心情懊喪，使其精神失調，使其「理想」與機械現實發生矛盾的一種正式根據。但我們既已假定「月亮底精神狀態」歸根到底完全是由它的運動來決定，於是我們也就要在它的運動中去探求那些使它精神失調的原因。如果我們留心來觀察事情，那我們也許能看出，當月亮處在遠點時，它是以其意志不自由爲憾的，而當它處在近點時，它却又會覺得這是使它精神爽健的新的正式根據了。也許結果恰巧相反：也許它不是在近點，而是在遠點能找到使自由與必然互相融洽的機會。但是無論如何，這樣互相融洽是完全可能的；必然的認識是完全能同最堅毅的實際行動相融洽的。至少迄今歷史上的情形常是如此。否認意志自由的人，往往要比其一切同代人

tourner indépendamment de quelque autre cause, 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s insensibles de la matière magnétique. Leibniz, Théodicée, Lausanne, MDCCCLX, p. 598. (「這恰好似磁針沒有發覺磁性底作用，以爲它是自行轉動，根本不受任何原因所決定，因其向北方轉動而感到快樂一樣」。見萊布尼茨所著辯神論一書。——譯者)。

都有更堅強的意志，並且對於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種例子是人所共知的。只有故意不願意看見真正歷史現實的人，才會如史達木萊爾那樣忘記這種例子。例如，我國主觀主義者和德國某些庸人就是極不願意看見真正歷史現實的。但庸人和主觀主義者並不是人，而是如拜林斯基（註五）所說一樣不過是些幻影罷了。

現在我們來仔細看看一個人覺得自己的——過去的，現時的或將來的——動作完全是必然性結果的那種場合吧。我們已經說過，在這種場合，一個人既如拿破崙那樣自認是替天行道的使者，或如謨罕默德那樣自認是不可逃避的天運所選定的人物，或如十九世紀的某些社會活動家那樣自認是代表着不可遏止的歷史運動力量的人物，那他就會表現出幾乎是自發式的強大意志力量，把大大小小的哈姆列特所築成的那些當前障礙盡行掃除*，好像疾風掃敗葉一般。但是，我們感覺興趣的是這種情形底另一方面，即

*讓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來具體證明這種人底情感何等強烈。菲拉爾公主萊奈（法王路易十二底女兒）在她致教師加爾文的信中寫道：「我當然沒有忘記你所寫給我的那些話：達維得對上帝底敵人懷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也始終不會持另一種態度：要是我知道皇帝，即我的父親，皇后，即我的母親，以及我已故的丈夫（feu monsieur mon mari）和我親生的兒女是為上帝所摒棄了的話，那我就會對他們懷不共戴天的仇恨，惟願他們落入地獄」等等。懷有這種情感的人，該能表現出何等巨大而堅強的毅力呵！而這些人都是否認意志自由的哩。

是如下這一方面。當我認爲我的意志不自由只是表明我主觀上和客觀上完全不能不如我作的那樣去作時，當我瞭解我的這種動作也就是各種可能動作中最合我的心願的動作時，那我就認爲必然性是與自由同一，自由是與必然性同一的，於是我不自由的地方就會只在我不能違反自由與必然性的同一，只在我不能使二者彼此對立，不能覺到我自己受必然性所拘束。然而這樣缺乏自由，也正是表明有極完備的自由。

琴梅爾(註六)說過，自由始終是意味着不受某種拘束，自由若不瞭解成爲與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沒有什麼意思了。這話當然說得不錯。但是，決不能根據這種細微粗淺的真理來推翻哲學思想所作出的一種最英明的發現，即認爲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這一原理。琴梅爾所下的定義太狹了：這一定義只能是指不受外部拘束的那種自由而言。當我們還只講到這樣的拘束時，若把自由與必然性看作同一個東西，那就可笑已極了：一個想從你的衣袋中偷去新手帕的小偷遇到你的抵抗而又還沒有用某種辦法打破你這種抵抗的時候，當然是不能自由偷去你這個手帕的。但是除了這種粗淺的自由觀之外，還有一種比這深刻得無比的自由觀。沒有哲學思想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這種自由觀的，而且具有哲學思想的人，也只有已經擺脫二元論並瞭解主體與客體間根本沒有二元論者所設想的那種不可逾越的界限時，才能領會到這種自由觀。

俄國主觀主義者(註七)用其烏托邦理想來同我國資本主義的現實相對立，並且不能

超過這種對立一步。主觀主義者陷進了二元論的泥潭。那些所謂俄國「門徒」（註八）底理想，其近似資本主義現實的程度是比主觀主義者底理想少得不可計量的。雖然如此，但這些「門徒」畢竟找到了把理想與現實連接起來的橋樑。「門徒」底見解提昇到一元論了。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是走向於本身的否定，因而使他們——俄國「門徒」，並且不只是俄國「門徒」——所提出的理想見諸實現。這是歷史的必然性。「門徒」就是充當着實現這種必然性的一種工具，並且他們由於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以及因這種地位所造成的理智和道義性格，也不能不充當這種工具。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既然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具有這種性格而不是具有別種性格，於是他們也就不僅充當實現必然性的工具，不僅不能不充當這種工具，而且很願意，並且不能不願意充當這種工具。這就是自由的方面，並且這種自由是從必然性中生長起來的，更正確點說，是與必然性同一的自由，是變成了自由的必然性*。這樣的自由也是免除某種拘束的自由；它

* „Die Notwendigkeit wird nicht dadurch zur Freiheit, dass sie verschwindet, sondern dass nur ihre noch innere Identität manifestiert wird.“ 「必然性之所以變成爲自由，並不是因爲必然性已歸於消失，而祇是因爲它的那種暫時還是內在的同一性表現出來了……」——譯者）。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ürnberg, 1816, Zweites Buch, S. 281。

也是與某種約束對立的：深刻的定義並不推翻粗淺的定義，它補充着粗淺的定義而將其包括進去。既然如此，那末究竟還可談到什麼拘束，什麼約束呢？顯然，這裏只可談到尚未擺脫二元論的那些人底毅力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拘束；只能談到不知應怎樣把理想與現實連接起來的那些人所受到的約束。當一個人還沒有用哲學思想上的英勇努力爭得這種自由時，他當然還不能完全自作主張，不能不因遇見那種與他對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恥的苦痛。可是當他一旦擺脫這種苦惱和可恥的拘束重壓，而他的自由活動已成爲必然性底自覺和自由表現時，那他就會獲得他從來所不知道的一種嶄新的完滿的生命了*。那時，他就會成爲偉大的社會力量，世上沒有什麼東西能阻礙他，而且沒有什麼東西會阻住他如

天雷神電

轟擊妖邪……

* 這位老黑格爾在另一個地方又卓絕地說過：“Die Freiheit ist dies, Nichts zu wollen als sich”
「自由不過是個人本身的確立而已」——譯者。Werke, B. 12, S. 98.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三)

再重複說一遍：對於某種現象絕對必然性的認識，只能加強每一同情此種現象並認為自己是引起此種現象的一種力量的個人底毅力。如果這樣一個人認識了該現象底必然性以後却竟袖手旁觀，那就只是表明他不懂得算術而已。例如，我們假定說某種條件總和S具備時，現象A就會必然要發生。你已經給我證明，這個總和中的一部分已經具備，另一部分到T時就會具備的。於是同情於A現象的我知道了這點，便贊歎道：「妙極了！」，說罷便鼾睡起來，一直睡到你所預測的那個事變到來的那個吉日良辰為止。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就會是如下述。在你的計算中，在現象A發生所必需的條件總和S中，本來是把我的動作也包括在內的，——假定我的動作是等於a。但因為我鼾睡去了，於是在T時所有促進這一現象發生的條件總和就不會是S，而是S— $\frac{a}{b}$ ，結果當然會使情形有所改變的。也許那時忽然有另一個人來替代我，此人本來也是近於無所作爲，不過幸虧他因看見我消極冷淡得太豈有此理而有所感慨。於是，力量a就會由力量b所替代，而如果a等於b（ $a \parallel b$ ），那末促進現象A發生的條件總和就會仍然是等於S，而現象A也就會終究是在T時發生。

但是假如不能認為我的力量是等於零，假如我是個靈巧能幹的工作者，假如沒有什

麼人來替代我，那就不會有完整的總和S，而現象A也就會發生得比我們所預料的遲些，或是不會發生得如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完滿，或是甚至完全不會發生。這是個非常明顯的道理，如果我不明白這個道理，却竟以為在我叛變以後，S仍然是S，那就只是因為我不會計算而已。然而是否只有我一個人不會計算呢？你會預告過我說在T時一定會有總和S，而你却没有料想到我同你談話後就立刻跑去睡覺了；你竟確認我始終是個很好的工作者；你竟把不很可靠的力量看成了很可靠的力量。可見，你也計算錯了。但是，我們就假定你絲毫也沒有弄錯，而是把一切都考慮到了吧。那末你的計算就會是如下述：你本來是說在T時總和S就會具備的。這個條件總和中包括有一個負數，即我的叛變；同時這中間還包括有一個正數，即意志堅強的人因確信其意向和理想是客觀必然性底主觀表現而發生的那種努力工作精神。在這種場合，總和S就會真正在你所預料的那個時刻具備，而現象A也就會真正按時發生。這大概是很明白的了。既然這很明白，那末究竟為什麼我竟會因想念到現象A必不可免而感覺慌張呢？為什麼我會覺得這種必然性注定要我無所作爲呢？為什麼我談論這種必然性時，竟會把最簡單的算術法則忘記了呢？大概是因為我所受的那種特殊教育養成了我這種極想無所作爲的癖性，而如同你進行的談話又使我這種劣根性一觸即發。不過如此而已。對於必然性的認識在這裏不過是成了我這種頹唐卑劣習性藉以暴露出來的緣由。要把它當作造成我這種頹唐

習性的原因。是絕對不可能的：原因並不是對於必然性的認識，而是我受到的那種特殊教育。由此可見：由此可見，算術原來是一門非常可敬和十分有益的科學，它的法則甚至是哲學家先生，甚至特別是哲學家先生不應忘記的哩。

若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對某種現象的發生不表同情，並設法加以阻撓，那末他對這種現象必然性的認識，又會怎樣影響到他的行為呢？這裏的情形就有點不同了。這種認識也許會使他的反抗力量減弱下去。但是反對某種現象的人要到什麼時候才會信服這種現象的必然性呢？只有當促成這種現象的條件已經很多而且很強大的時候。反對這種現象的人們對於這一現象到來的必然性的認識，以及他們反抗力量的衰落，這都不過是表現出促使該現象發生的種種條件強大有力罷了。這種表現，也要算是促使該現象發生的一種條件。

然而，並不是所有反對該現象的人都會減弱其進行反抗的努力。其中有些人恰好會因認識到此一現象的必然性而加緊進行反抗，以至於拚命掙扎。在一般歷史上，尤其是在俄國歷史上有過不少表明這種拚命掙扎而值得玩味的例子。這種例子想必讀者自己也能夠記憶起來，無須我們來妄費唇舌吧。

說到這裏，卡列夫先生就來打斷我們的話，他雖則當然不贊成我們對於自由與必然性的觀點，並且不贊同我們偏袒意志堅強份子「極端主張」的態度，但他終究以在我們雜

誌上讀到我們認爲個人能成爲偉大社會力量的這種意見而感到滿意。這位可敬的教授先生高興地喟然感歎道：「我向來都是這樣說的呀！」。這話倒也正確。卡列夫以及所有的主觀主義者，確實是向來都認爲個人在歷史上有極大的作用。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他們是因這樣主張而博得過一班先進青年方面很大的同情的，這班青年極力想從事裨益於社會的高尚勞作，所以自然極爲重視個人倡導精神底作用。但是老實說來，主觀主義者不僅始終沒能解決，甚至沒能正確提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他們把「有批評頭腦的個人底動作」與社會歷史運動規律底影響對立了起來，因而創造出了一種似乎新穎的因素論：有批評頭腦的個人是社會歷史運動底一種因素，這個運動本身的規律則是它的另一種因素。由此就得出了一種極不合理的觀念，這種觀念祇有當那些積極的「個人」還專心致志於實際迫切問題，因而無暇研究哲學問題的時候，才勉強可以使人認爲滿意。而當八十年代到來的沉寂時期已使那些有思想頭腦的人獲得一種出乎心願之外的閑暇功夫來從事哲學思考的時候，於是主觀主義者底學說便顯得破綻百出，甚至好像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註九）那件鼎鼎大名的外套一樣根本破檻了。無論怎樣修補也補不成功了，於是有思想頭腦的人就相繼棄絕了主觀主義這個分明全無根據的學說。但是，正如一般在此種場合所常見的情形那樣，這一學說所引起的反感竟使某些反對這一學說的人走到了另一極端。如果說某些主觀主義者因力求拚命抬高「個人」在歷史上的

作用而不肯承認人類歷史運動是規律性的過程，那末現代某些反對主觀主義者的人却就因力求拚命強調這種運動底規律性而顯然決意要把歷史是由人所創造，因此個人底活動在歷史上不能不發生作用這一原理置之腦後了。他們把個人看成是 *quantité négative*。這種理論上的極端性是與極熱烈的主觀主義者所犯的那種極端性同樣不容寬恕的。爲了反題而忘掉正題，也如爲了正題而忘掉反題一樣，同樣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有把正題與反題中間所包括的真理成分統一成爲一個合題的時候，才能得出正確的觀點來**。

* 「值不得注意的東西」——譯者。

** 在追求合題方面，卡列夫也搶過了我們。只是可惜他沒有超出人是靈魂和肉體所構成的這個真理

範圍一步。

(四)

這個任務早已就使我們感到興趣，因此我們早已就想請讀者來同我們一塊解決這個任務。但我們因有一些顧慮而沒敢這樣作；我們總以為也許我們的讀者自己已經解決了這個任務，因而我們的提議未免太遲了。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這種顧慮了。德國史學家已經替我們打消了這種顧慮。這是真情實話。原來最近一個時期在德國史學家中間發生了關於偉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的激烈爭論。有的認為偉人底政治活動是歷史發展中主要和幾乎是唯一的原動力，有的却又認為這是種片面觀點，說歷史科學不僅應當注意到偉人底活動與政治歷史，並且要注意到全部歷史生活(das Ganze d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蘭普勒赫特(註一〇)就是後一學派中的一份子，他著有德國民族史一書，此書已由尼古拉也夫先生譯成了俄文。反對蘭普勒赫特的人責備他是個「集產主義者」，是個唯物主義者，甚至把他——horribile dictum!——同「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神論者」混為一談，如他自己在爭論結語中所說過的那樣。我們認識了他的觀點以後，才知道人們加予這位可憐學者的種種罪名，都是毫無根據的。同時我們又知道了現代德國史學家沒有能

*「真是言之可怕！」——譯者。

力解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於是我們就認爲我們有權來設想，這個問題對於某些俄國讀者也是至今尙未解決，因此現在關於這個問題也還可以說一點並非全無理論和實踐價值的話。

蘭普勒赫特蒐集了一大批 (eine artige Sammlung, 據他自己說) 國家英俊人物自己對於自己活動與其所處歷史環境間的關係的見解；但他在爭論中，暫時還只援引過俾斯麥所發表的某些演說和意見。他引證了鉄血宰相於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北德議會中所說的如下一段話：「諸位，我們既不能忽視已往，也不能創造未來。有人常將自己的錶針移前一些，以爲這樣就能把時間加快，但這實在是一種錯誤，我希望諸位加以避免。一般人通常過分估計了我對於我所依靠的那些事變的影響，可是始終沒有一個人想到要我來創造歷史。這種任務是我同諸位聯合起來行動也辦不到的，雖說我們聯合起來便能與全世界相抗。然而我們畢竟不能創造歷史；我們應等候歷史去自行造成。我們用火來溫暖菓樹，決不能加速菓子成熟的過程；我們把尙未成熟的菓子摘下來，是只會妨礙菓子成長而使其腐壞的」。然後，蘭普勒赫特又根據紹里所作記述引錄了俾斯麥在普法戰爭時期說過多次的意見。這種意見大體上也還是說：「我們不能創造偉大的歷史事變，而應當適應自然進程，只能設法享受已經成熟的果實」。蘭普勒赫特認爲這是個深刻而過備的真理。在他看來，現代的史學家若不局限於很短一段時間而去探察

事變遠因，便不會有另外一種想法。俾斯麥能不能把德國拉回到自然經濟時代去呢？這是他在他威勢最高的時候也做不到的。一般的歷史條件，要比任何意志堅強的個人更爲強大。偉大人物所處時代底一般性質對於偉大人物是種「實在的必然性」。

蘭普勒赫底意見就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觀點稱爲萬有史觀。這個「萬有」史觀底弱點，是不難發現的。他所援引的俾斯麥意見是很有趣的一種心理證據。對於前德國宰相底活動儘可不表同情，可是決不能說他這種活動渺不足道，決不能說俾斯麥是個帶有「無爲主義」色彩的人。拉薩爾論到俾斯麥的時候說過：「反動勢力底僕役並不長於談吐，但我們很希望進步勢力能多有這樣的僕役」。這樣一個往往表現過真正鋼鐵般意志的人竟也自認爲完全無力違反客觀自然進程，因爲他大概認爲自己不過是歷史發展底一種工具哩；這件事實又告訴我們，一個根據必然觀來看待現象的人，同時又可能是個意志很堅強的活動家哩。但也只有在這一點上，俾斯麥底意見才值得注意，若要用他這種意見來回答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却就絕對不行了。據俾斯麥所說，事變是自行造成的，我們只能設法享受事變所預備好了的東西。但是，每次「設法享受」的舉動也是一種歷史事變：這種事變與那些自行造成的事變究竟有何區別呢？其實，幾乎每一次歷史事變一方面既是某人「設法享受」先前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果實，同時又是預備未來果實的那些事變鎖鍊中的一環。試問怎樣可以把「設法享受」的舉

動與自然的進程對立起來呢？俾斯麥底意思大概是要想說，在歷史上活動的個人或集團從來不是，而且將來也永遠不會是萬能的。這點當然絲毫不容疑義。但我們畢竟想要知道：他們的力量——固然是遠非萬能的力量——究竟要依什麼為轉移；這種力量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會增長起來，在什麼情況下又會減少下去呢。對於這些問題，無論俾斯麥自己，亦無論那位援引俾斯麥言論的博學的「萬有」史觀者，都是沒有給予一個回答的。

誠然，我們在蘭普勒赫特那裏也可讀到一些較為值得玩味的引證*。例如，他從法國現代史學界最大權威之一的莫諾作品中引證過如下一段話：「史學家太習慣於專門注意那些燦爛響亮曇花一現的人類活動表現，注意偉大的事變和偉大的人物，却不願說明經濟條件和社會制度偉大而緩慢的運動，這種經濟條件和社會制度正是人類發展中真正重要而非暫時性質的部分，——這一部分在某種程度內是可以歸結為一種法則，並且在相當程度上還可拿來確切分析的。須知，偉大事變和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兩者是個發展中各種情況底符號和象徵。至於大多數所謂歷史事變，則它們對於真正歷史，也

* 我們在此地且不說及蘭普勒赫特的其他哲學歷史論文，而始終只是講到他的論文“Der Ausgang des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Kampfes”，“Die Zukunft”，1897, No 44。

好像海面的波浪對於來潮和退潮底深遠經常運動一樣，是根本不關重要的：波浪發生，一時光彩燦爛奪目，隨後一觸着沙岸，就會被擊破，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的」。蘭普勒赫特聲明，說他對於莫諾這段話中每一句話都極表贊同。大家知道，德國學者是不愛贊同法國學者，而法國學者也是不愛贊同德國學者的。因此，比國史學家皮萊恩就在《Revue historique》上興高采烈地強調了莫諾底歷史觀點與蘭普勒赫特底歷史觀點這樣吻合的事實。他說：「這樣一種吻合極為重要，因為它證明新的歷史觀點顯然有遠大的前途」。

(五)

我們可不能對皮萊恩所持這種愜意願望表示贊同。模糊曖昧的觀點決不會有什麼遠大的前途，而莫諾，尤其是蘭普勒赫特底觀點，却正是這樣的觀點。把研究社會制度和經濟條件當作歷史科學主要任務的學派，當然應該受到歡迎。當這個學派在歷史科學中最終鞏固時，歷史科學就會獲得長足的進步。但是，第一，皮萊恩把這個學派當作新學派看待，是未免錯誤了的。歷史科學中這一學派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產生了：基佐，米尼厄，梯葉里（註一），以及後來的多克維爾等人，便是這個學派中卓越一貫的代表人物。莫諾與蘭普勒赫特底觀點，不過是從一個老舊而頗為光輝的藍本上模印下來的一種模糊的抄本罷了。第二，基佐，米尼厄及其他法國史學家底觀點在當時雖然可算深刻，但它中間總還有許多東西沒弄清楚。其中對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沒有給予一個確切圓滿的回答。然而歷史學家如果真要擺脫其對於本門科學的片面觀點，那末歷史科學確實是應該解決這個問題的。只有對這個問題也能給予一個最好答案的學派，才是具有遠大前途的學派。

基佐，米尼厄以及該派其他史學家底觀點是十八世紀的歷史觀點所引起的一種反應，是十八世紀的歷史觀點底反題。十八世紀研究歷史哲學的人把一切都歸因於個人

底·自·覺·活·動。誠然，當時也有過一些越出一般規例的例外：例如，韋科，孟德斯鳩或赫得爾（註一三）底哲學歷史眼界，就要廣大得多。但我們現在所講的並不是這種例外；至於十八世紀的絕大多數思想家，却是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去觀察歷史的。就這一點來說，現在把例如馬布里（註一三）這樣一位史學家底作品閱覽一下，是很有趣味的。據馬布里所說，克里特島人底社會政治生活和風俗是由邁諾斯一手造成，李庫爾對於斯巴爾特的貢獻也是如此。斯巴爾特人之「鄙薄」過物質財富，完全應歸功於李庫爾，因為他「深深鑽進到同胞們底心坎裏去壓倒了貪財心理之芽」*Oeuvres complètes de l'abbé de Mably, Londres 1789, tome quatrième, p. 3, 14—22, 34 et 192**。而斯巴爾特人後來離開英明李庫爾指點給他們的這條道路，却應歸罪於來山特，因為來山特居然叫他們相信「新時代和新環境要求他們採取新規則和新政策」^{**}。用這種觀點所寫成的作品，實在與科學作品很少相干，不過是專為引伸出一些所謂道德「教訓」而寫述的一種教義罷了。復辟時代法國史學家毅然反對的正是這種觀點。有了十八世紀末葉驚天動地的事變以後，已經絕對不能設想歷史是某些較為傑出人物或較為高尚開明的

* 參看 (descendit pour ainsi dire jusque dans le fond du cœur des citoyens etc.)。

** 參看同書，第一〇九頁。

人物所一手做成的事情，以為他們能夠隨心所欲，用某種情感和觀念去訓示那些沒有知識而又唯命是聽的民衆了。況且，這種歷史哲學又還激怒了資產階級理論家底平民自尊心理。這裏可以看出早在十八世紀資產階級戲劇發生時期就已經表露出來的那種情感。梯葉里在反對舊的歷史觀點時，又還運用過波馬什等人所提出來反對舊時審美觀的那些論據*。末了，法國不久前所經歷過的風暴時期，又很明顯地證明了歷史事變進程決非只是由人們自覺的行爲所決定；單是這一情況已不免要叫人想到，此種事變是在一種隱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發勢力那樣盲目而又依照某些不可變移規律動作着的必然原因影響下發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實，——雖然我們知道，這件事實在先前誰也沒有指出過，——是把歷史看作一個規律性過程的這種新觀點已由復辟時代的法國史學家在論述法國革命的著作中最為澈底地發揮過了。如例，米尼厄和梯也爾（註一四）兩人底著作就是明證。沙托布里翁把新的歷史學派稱為宿命論派。他論述這個學派所提出的研究任務時說道：「這種學說要求史學家論述最殘忍的暴行時不表憤慨，說到最高尚的德行時不表愛感，要用冰冷的眼光觀察社會生活，認為社會生活不過是不可抵抗的規律

* 請參論法國歷史的第一封信與波馬什所著 *Ouvres completes* 第一卷中的 *«Essai sur le genre dramatique sérieux»* 「對照」。

底表現，這種規律使一切現象都正如它們所必然要發生的那樣發生*。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新學派並沒有要求歷史家持冷眼觀察態度。梯葉里甚至坦白地說過，政治熱情磨研着研究者底頭腦，能成爲發現真理的強有力手段**。所以只要稍微看看基佐，梯葉里或米尼厄底歷史作品，就可知道他們熱烈贊助過資產階級反對俗家與宗教貴族的鬥爭，以及資產階級打破新興無產階級要求的企圖。然而有一件事實是不容爭辯的，這就是新的歷史學派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當時貴族雖然還企圖恢復某些舊有特權，但它已被資產階級打敗了。在新學派史學家們所有一切議論中都反映出他們的階級以獲勝自豪的意識。既然資產階級從來未曾有過騎士氣概，所以從它那些有學問的代表人物底議論中往往可以窺見殘忍對待被戰勝者的態度。基佐在他的一本辯論的小冊子中說過，*«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cela est de droit»*（弱肉強食，理所固然）。它對工人階級也持着同樣殘忍的態度。這種殘忍態度有時竟表現成爲冷酷眼色，因而就使莎托布里翁走入迷途。此外，當時還不完全明白究竟應該怎樣來瞭解歷史運動

*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ateaubriand*, Paris 1860, t. VII, p. 58. 此外還請讀者注意下面一頁；這一頁簡直令人覺得是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執筆寫成的。

** 參看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附錄於 *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Paris 1940, p. 72.

規律性。末了，新學派之所以竟能使人覺得它是個宿命論派，乃是因爲它力求堅決主張規律觀，而很少注意到偉大歷史人物*。受過十八世紀歷史思想薰陶的人，當然很難容忍這種觀點。所以，新史學家也就受到各方面紛至沓來的反駁，因而發生了我們已經說過的至今尙未結束的那種爭論。

一八二六年一月，聖畢夫在《Globe》上論及當時出版的梯葉里所著法國革命史第五第六兩卷時寫道：「一個人物隨時都能依其意志底突然決定，對事變行程添加一種意外而可能變化的力量，這種力量能使事變行程變更方向，但這種力量本身却是不可測量的，因爲它是可能變化的」。

決不要以爲聖畢夫曾認定人類意志底「突然決定」是種毫無原因的現象。這樣設想

*聖畢夫(註一五)在其評論米厄所著法國革命史第三版的一文中，把這位史學家對人物的態度評述如左：「A la vue des vastes et profondes émotions populaires qu'il avait à décrire, au spectacle de l'impuissance et du néant où tombent les plus sublimes génies, les vertus les plus saintes, alors que les masses se soulevèrent, il s'est pris de pitié pour les individus, n'a vu en eux pris isolément que faiblesse et ne leur a reconnu d'action efficace, que dans leur union avec la multitude。」當他看見他所必須記述的那些廣大深入的民變時，他眼看那些最高尚的聖哲和最純潔的善人在民衆起義的場合顯得毫無辦法和毫無力量，便不禁爲之傷感，認爲人物孤獨來說總是軟弱無力，認爲他們不同羣衆結合便不能有何實際作爲」——譯者。

是未免太幼稚了的。他只認定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發生較為重大作用的那些智慧上道義上的特性，即材能，知識，堅決或猶豫，勇敢或胆怯等等，不能不對事變進程和結局發生顯著的影響，這些特性又不單只是取決於國民發展底一般規律，而永遠並且大半是在可以叫作私人生活偶然現象的影響下形成。我們且舉幾個例子來把這個顯然無須說明的思想說明一下。

在奧皇繼嗣戰爭時期，法國軍隊獲得過幾次輝煌的勝利，所以法國當時顯然能從奧國方面索得現今比國境內很大一部分領土的讓步；但路易十五却並沒有索取過這種讓步，因為他——據他自己說——並非以一個商人資格，而是以一個國王資格進行戰爭的，所以亞琛和約也就使法國一無所得；但假如路易十五具有另外一種性格，那末法國領土也許會擴大起來，而它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進程也就會稍有不同了。

大家知道，七年戰爭，法國却已是同奧國結成聯盟來進行的了。據說，在締結這次聯盟的事情上，保拜都爾夫人（註一六）出力甚大，這是因為她深以驕傲的馬利亞在寫給她的那封信裏稱她做表妹或親愛的女友（*bien bonne amie*）為幸。因此我們可以說，若是路易十五底性情嚴峻一點，或是說，如果他沒有那樣厲害地屈服於他那些寵妃底影響，那末保拜都爾夫人也就會不能對事變進程起這樣重大的作用，而事變底局勢也就會是另外一種樣子了。

其次，七年戰爭結果是於法國不利的：法軍將領遭到過幾次可恥已極的失敗。而且他們的舉動根本就是奇怪已極：黎塞留專幹擄掠勾當，蘇俾茲和布洛利兩人始終是互相掣肘。例如，當布洛利在費里高尊一帶對敵人實行攻擊時，蘇俾茲雖聽見了砲聲，但他却沒有依照預先約定並且顯然是他所應該作的那樣去援助這位同袍，結果竟使布洛利不得不實行退却*。而當時袒護極庸碌將官蘇俾茲的仍是那位保拜都爾夫人。所以我們又可以說：假如路易十五不是如此好色成性，或是說，假如他這位寵妃沒有干預政事，那末事變結果也許不會這樣不利於法國的。

據法國史學家說，當時法國根本不應該在歐洲大陸作戰，而是應該集中全力到海上去反對英國侵略法國殖民地領土的行動。法國之所以沒有這樣去作，又是由於保拜都爾夫人底過失，因為她始終都想在她那位「親愛的女友」馬利亞面前討好。由於七年戰爭的結果，法國喪失了最好的殖民地領土，結果無疑是對法國經濟關係發展進程有過重大的影響。在這裏，女人的虛榮心理竟成了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強大「因素」。

還要舉出其他什麼例子來說明一下麼？那末就讓我們再舉出一個也許是最鮮明不過

*有些人却說當時錯的不是蘇俾茲而是布洛利，因為布洛利不願同蘇俾茲分沾功名，所以沒有等候他來援助。但這對於本題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這不能把情形改變絲毫。

的例子來說說吧。同是在這個七年戰爭時期，一七六一年八月間，奧軍在西里細亞同俄軍匯合之後，已把當時駐紮在施特里高一帶的腓特烈軍隊包圍起來了。腓特烈處境危急萬分，但聯軍却一再遷延攻擊，而俄將布圖林（註一七）在敵軍面前停駐二十日之後，甚至完全退出了西里細亞，只留下一部分軍隊去支援奧將 牢敦。牢敦佔領了距腓特烈軍隊據守地點很近的什維尼茨城，但這次勝利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若是布圖林為人堅決一點，那結果又會怎樣呢？若是聯軍向腓特烈舉行了攻擊，使其無法築壘固守，那結果又會怎樣呢？也許聯軍會把腓特烈完全擊破，使其不得不接受勝利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哩。可是經過幾月後又發生了一次偶然事件，即俄女皇依利薩伯病歿，結果竟使局勢一下子就變得大大有利於腓特烈了。試問：假如布圖林為人較為堅決一點，或者說，假如當時擔任指揮職務的不是他而是如蘇渥洛夫（註一八）那樣的一個人，那結果又會怎樣呢？

聖畢夫批判「宿命派」史學家底觀點時，又還說出過我們所應注意的另一種意見。他在我們已經摘引過的那篇論米尼厄法國革命史的文章中，認為決定了法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的不僅有這次革命所由以發生的一般原因，也不僅有這次革命反過來所激起的種種情欲，並且還有常被一般研究家忽略過去，甚至完全不能真正叫作社會現象的許多細小現象。他寫道：「當這些（一般）原因和（由它們所引起的）種種情欲發生作用的時

候，自然界的物理和生理因素也不是無所作爲的：石頭仍然受着地心吸引力的支配；血脈也沒有停止循環。假若米拉波未因偶患寒熱病症死去，假若羅伯斯庇爾忽被偶然墜落下來的一塊磚瓦擊死或因患腦沖血病死了；假若拿破崙中彈殞命了，那末事變進程難道不會有所變更麼，難道你們敢於斷定說事變結局也會是那樣的麼？當我所假定的那種偶然事件充分具備時，事變進程就會與你們所認爲不可避免的這種進程完全相反。而我這樣假定是有理由的，因爲革命底一般原因及其所引起的那種情欲並不能排斥這種偶然現象。』

接着，他又援引人所共知的意見，說要是克列奧帕特爾皇后底鼻梁生得矮一點，歷史進程也許會成爲完全另一種樣子；最後，他認爲雖然可以說出許多理由來辯護米尼厄底觀點，但他又指出了米尼厄錯誤的地方。他說：『米尼厄把一切結果都歸因於一般原因的作
用，殊不知這些結果同時也是由其他許多細小曖昧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的；米尼厄底嚴格頭腦，好像根本不願承認他所認爲沒含有一定次序和規律的那些現象存在。』

(六)

聖畢夫提出這種異議，是不是有什麼理由呢？看起來彷彿是有某些理由。究竟有多少理由呢？爲了確定這一部分理由，我們首先就要把認爲人能「用自己意志底突然決定」來給事變進程添進一種新力量而使其大大改變的這種意見考察一下。我們已經舉出了我們認爲極能說明這種意見的一些例子。現在我們就要把這些例子仔細思索一下。

大家知道，當路易十五在位時代，法國軍事力量愈益衰落下去。據馬爾騰所說，在七年戰爭時期，法國軍隊始終都有許多妓女、商人和僕役跟着，軍中輜重馬匹要比騎行馬匹多兩三倍，所以這個軍隊與其說是秋連和古斯達福、奧多爾夫那樣的軍隊，不如說是達里和薛西斯那樣的匪羣*。阿恆合爾茨在記載這次戰爭經過的著作中指出說，當時法軍中被指定放哨的官長，往往隨便離開哨所跑到鄰近地方去跳舞，只有他們認爲必要和方便的時候，才肯執行上司命令。法國軍中情形這樣惡劣，是由於貴族階層衰敗，——但當時這個階層仍然把持着軍中一切高級職位，——以及當時全部「舊秩序」因普遍解體而迅速陷於破壞的緣故。單只這些一般原因，已經完全足夠使法國在七年戰爭中處於

* «Histoire de France», 4me édition, t. XV, p. 520-521.

不利的地位了。但是，蘇俾茲一類將領庸碌無能的事實顯然又使法軍由一般原因決定的那種失利危險加增起來。既然蘇俾茲底地位是全靠保拜都爾夫人來支持，於是我們就必須承認，這位貪求虛榮的夫人乃是在七年戰爭時期大大加深了一般原因對法國不利影響的一個「因素」。

保拜都爾夫人之所以強而有力，並非由於她自己有什麼力量，而是因為大權在握的國王聽從她的意旨。能不能說路易十五底性格按照法國當時社會關係發展進程定應如此呢？決不能這樣說。在當時那樣的發展進程中，也可能有一個用別種態度對待女人的國王出現。聖畢夫也許會說，這裏只要有一種不可捉摸的曖昧生理原因底作用就行了。如果他真這樣說，那他就會說得正確。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這種曖昧的生理原因既影響到七年戰爭底進程和結局，也就影響到了法國後來的發展情形，因為法國如果在七年戰爭中沒有失去一大部分殖民地領土，它的發展情形也許會是另一種樣子哩。試問這個結論是否與社會發展規律性的概念相抵觸呢？

不，絲毫不相抵觸。個人的特性在上述場合發生過作用是沒有疑問的；但這種作用只有在當時那種社會條件下才能發生，也同樣是沒有疑問的。自法軍在羅斯巴遭到失敗以後，法國人民對於庇護蘇俾茲的這位女人極表憤慨。她每天都收到許多充滿威脅

詈罵的匿名書信。因此保拜都爾夫人深爲焦慮，寢不安席*。雖然如此，但她還是極力袒護蘇俾茲。一七六二年，她在致蘇俾茲的信中一面責備他有負厚望，接着便補充說：「但你不必畏懼，我會設法來保護你，消除國王對你的誤會」**。可見，她並沒有對法國社會輿論讓步。爲什麼她沒有讓步呢？大概是因爲當時法國社會沒有可能強迫她去讓步。爲什麼當時法國社會不能做到這點呢？原來是因爲當時法國社會本身結構惡劣，而這種惡劣的社會結構又是由當時法國社會力量對比關係決定的。由此可見，社會力量的對比關係，也就是路易十五底性格及其寵妃底癖性竟能對法國命運發生出這樣一種悲慘影響的根本原因。如果具有這種寵愛女癖性的不是國王本人，而是王室中某一個廚司或馬夫，那這種癖性就不會發生什麼歷史作用。可見，問題並不在於這種癖性，而是在於具有這種癖性的人所佔的社會地位。讀者當然懂得，這種論斷對於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是適用的。只是在運用這種論斷的時候把應當改換的對象改換一下就就行了，例如把法國換成俄國，把蘇俾茲換作布圖林等等。因此，我們也就不去重複這些論斷。

由此可見，個人因其性格帶有某種特點而能影響到社會底命運。這種影響有時甚

* 參看《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 Paris 1824, p. 181.

** 《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 Londres 1772, t. 1.°

至是很大的，但這種影響表現的可能及其範圍，却要依當時的社會結構，以及當時的社會力量對比關係來決定。個人底性格只有在社會關係所容許的那個時候、地方和程度內，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因素」。

也許有人會說，個人影響底範圍是與個人材能也有關係的。是的，我們同意這種意見。但個人祇有在社會上佔有相當的地位時，才能表現出自己的材能。爲什麼法國命運竟能操在一個既沒有什麼能力，也沒有什麼熱心去替社會服務的人物手中呢？這是因爲法國當時的社會結構會是如此。正是這種社會結構，才使某些賢明人物或庸碌份子在某時候能表現一定的作用，因而也就能表現出一定的社會影響。

個人底作用既然是由社會底結構來決定，那末試問他由這種作用所制約的社會影響，又怎麼會與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概念相抵觸呢？個人底社會影響不僅不與這種概念相抵觸，並且是對於這種概念的一種最鮮明的證實。

不過這裏必須說明一點。既然個人有可能表現出受社會結構制約的社會影響，於是那些所謂偶然現象就能影響各國人民底歷史命運。路易十五好色成性，原是他那種體質底必然結果。但這種體質對於法國一般發展進程却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但我們已經說過，這種體質對於法國後來的命運不是沒有發生影響，而是成了決定這個命運的一種原因。米拉波之死，當然是由於完全合乎規律的那些病理作用的結果。但這種病理作用

的必然性，並非由法國一般發展進程所引起，而是由這位著名演說家個人體質上某些特點以及他染受疫症時所處的那些物理條件所致然。這些特點和這些物理條件，對法國一般發展進程來說是種偶然的現象。可是米拉波之死却影響到了法國革命後來發展的進程，成了決定這個進程的諸原因中的一種原因。

在上述那個說明腓特烈第二只是因為布圖林優柔寡斷才得逃出窘境為例證中，偶然原因底作用表現得更為明顯。布圖林被任為俄軍總司令一事，甚至對於俄國一般發展進程也可說是我們所認定的那種偶然性的現象，而對於普魯士一般發展進程說來，當然更是毫不相干的。但實際上我們却很可斷言，只是由於布圖林優柔寡斷，才使腓特烈逃出了絕望的境地。如果當時被任為俄軍總司令的不是布圖林而是蘇渥洛夫，那末普魯士底歷史進程，也許會成為另外一種樣子的。可見，國家底命運有時候還會由一些可說是次等偶然現象的偶然現象來決定哩。黑格爾嘗說：„In allem Endlichen ist ein Element des Zufälligen“（一切終結現象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我們在科學中所考察的只是「終結現象」；因此可以說科學所研究的一切過程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這是否會使對於各種現象的科學認識成為不可能呢？絕對不會。偶然性是一種相對的東西。它只會是在諸必然過程交叉點上出現。歐洲人在美洲出現，對於墨西哥和秘魯土人說來是種偶然的現象，因為這種現象並不是從這幾個美洲國家底社會發展過程中發生的

結果。但西歐人在中世紀末期傾心於航海事業却不是偶然的；歐洲人底力量很快就打破了土人反抗，也不是偶然的。同樣，歐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而引起的影響，也不是偶然的；這種影響歸根到底是由兩種勢力底合成力所決定：一種勢力是各被征服國家底經濟狀況；另一種勢力便是各征服國家底經濟狀況。這兩種勢力及其合成力，是完全可以用嚴格科學眼光來考察的。

七年戰爭中的偶然現象，對於普魯士後來的發展史有重大的影響。可是，如果當時普魯士處於另一種發展階段，那末這些現象所發生的影響就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偶然現象底影響在這裏也是由兩種勢力底合成力所決定：一方面是當時普魯士底社會政治狀況，另一方面是當時影響了普魯士的那些歐洲國家底社會政治狀況。可見，這裏的偶然性也絲毫不能妨礙對於各個現象的科學研究哩。

由此可知，個人往往能對社會命運發生重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由該社會底內部結構及其對於其他諸社會的關係所決定的。但這還不能概括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我們還應從另一方面來考察一下。

聖畢夫以爲他所指的那種細小曖昧的原因完全具備時，法國革命就會有與我們所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了。這是個嚴重的錯誤。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細小原因錯綜結合得怎樣奇巧，但它們絕對不能消除法國革命所由引起的種種巨大社會需要；當這些需

要尙未得到滿足時，法國的革命運動是不會停止的。爲了使法國革命運動能有一種與當時實在結局相反的結局，就必須用相反的需要來代替這種需要；但這當然是任何一種細小原因的湊合也辦不到的。

法國革命底原因是在於當時那種社會關係底特性，聖畢夫所假定的那些細小原因却只能根源於單個人物底個人特點。社會關係底根本原因是在於生產力底狀況。生產力底狀況所取決於單個人物個人特點的地方，至多也不過是這種人物對於從事技術改良、技術發現和發明的能力的大小。聖畢夫所指的並不是這種特點。可是其他一切特點都不會使單個人物能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狀況，因而也就不能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社會關係，即經濟關係。當經濟關係適合於當時生產力狀況的時候，那末一個人物無論有怎樣的特點，也不能把這種經濟關係消除的。但是一個人物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夠從事於滿足當時經濟關係所引起的社會需要或阻礙這種滿足，却要由這個人物底個人特點來決定。十八世紀末期法國最迫切的社會需要，是要推翻陳腐政治制度，而代之以適合於法國新經濟制度的另一種政治制度。當時最有名望和最有益處的社會活動家，正是那些最能幫助滿足這種最迫切需要的人物。我們假定說米拉波，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就是這樣的人物。如果米拉波未因早死退出政治舞台，那末情形又當怎樣呢？那末，君主立憲黨就會把自己所有的巨大政治力量保持得較爲長久，於是它對於共和派的抵抗也就

會更爲堅強。但也不過如此而已。無論怎樣一個米拉波，都不能防止當時共和派底勝利。米拉波底力量全靠民衆同情和信任來支持，而民衆是趨向於共和制度的，因爲當時朝廷那種頑強保護舊制度的政策激怒了民衆。所以民衆一知道米拉波不同情於他們的共和趨向時，就會不復對他表示同情，於是這位大演說家底影響就會喪失殆盡，結果他就會由他自己徒然力圖阻止的那個運動所推翻。羅伯斯庇爾底情形大致也是如此。我們假定說他在他的黨內是個完全無可替代的大人物。但他畢竟不是這個黨內唯一的大人物。假如他在一七九三年一月間（註一九）偶然被墮落下來的一塊磚瓦打死了，那末當時一定會有另外一個人物來替代他，這個人物也許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他，但事變進程畢竟還是會按其在羅伯斯庇爾在世時所走的那種方向發展下去的。譬如說，基郎特黨人在這種場合也會不免要遭受失敗；不過，羅伯斯庇爾黨喪失政權也許來得更早一些，因而我們現在就會不是說熱月的反動（註二〇），而是說花月，草月或穉月的反動（註二一）。也許有人會說，羅伯斯庇爾所採取的殘忍恐怖手段，只是加速而不是延緩了他那個黨覆亡的時日。我們且不去考察這種假設，而把它當作一個完全有根據的假設吧。這樣一來，就會必須假定羅伯斯庇爾黨底覆亡不是發生於熱月，而是發生於果月，葡月或霧月。總而言之，這個事件也許發生得早一點，或是發生得遲一點，但它終究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爲這個黨所憑藉的那個人民階層沒有實行長久統治的能力。然而，無論如何也不會有與羅伯斯

庇爾所努力促成了的那種結果「相反的」結果發生。

我們就假定拿破崙在阿爾科會戰時中彈殞命了，但也不會有這種「相反的」結果發生的。拿破崙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征伐中所作出的事情，是會由其他的將領作出的。這些將領也許沒有拿破崙那樣的材能，也許不能獲得那樣輝煌的勝利。但法蘭西共和國畢竟還是會在當時各次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因為法國兵士比當時歐洲其他各國兵士都要優良得不可比擬。至於霧月十八日政變（註二三）及其對於法國內部情形的影響，那末事變底進程和結局實際上想必會與由拿破崙當權時的情形相同。因熱月九日反動政變而受到致命重傷的共和制度，已經是奄奄待斃了。督政部根本不能恢復當時擺脫了上層等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所渴望的秩序。當時爲要恢復秩序，就需要有如西依史所說的那樣一枝「寶劍」。起初大家以爲這種寶劍使命可以由朱伯爾將軍來執行，但當他在納威會戰時陣亡以後，大家便提到莫洛，麥唐納和被納多特等人了*。拿破崙這個名字，還是後來才被提起的。如果他也如朱伯爾那樣陣亡了，那末大家就根本不會談到他，而會提出另一枝「寶劍」來。自然，一個被事變抬上了獨裁者地位的人物，應該自強不息地鑽營政柄，堅毅果決地把一切阻礙他前進的人推開並予以無情打擊。拿破崙具有鉄一般

*參看 *La vie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 le vicomte de Broc, Paris 1895, pp. 35-36.*
及往下各頁。

的毅力，他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沒有留過什麼情面的。但當時除他而外，也還有過不少堅強能幹，貪圖功名利祿的人物。他所掙得了的那個位置大概是不會空閒起來的。假定另一位將軍爭得這個位置後，舉動比較拿破崙溫和一點，不會激起全歐洲的反抗，結果這位將軍就會是死在推勒里宮中（註三三），而不是死在聖葉倫島上。那末，布爾奔皇族就會根本無法回到法國來；這樣的結果，對於他們說來，當然是與實際上所發生的那種結果「相反」，但對於法國整個內部生活說來，却是與實際的結果很少區別的。當這枝「寶劍」恢復了秩序，保證了資產階級獲得統治以後，資產階級很快就會厭惡這枝「寶劍」所表現的那種軍營習慣和專擅行爲。於是就會有在復辟時代發生過的那種自由主義運動發生起來，鬥爭就會漸漸熾烈起來。既然那些「寶劍」不很愛作讓步，那末仁慈的路易腓力普代替他所厭惡愛慕的同宗來登王位也許不是在一八三〇年，而是在一八二〇年或一八二五年。事變進程中的這一切變化，也許能局部影響到歐洲後來的政治生活，並經過這政治生活而影響到歐洲經濟生活。但革命運動底最後結局終究是不會與實在的結局「相反」的。大人物憑靠他們那種頭腦和性格上的特點，雖然也能使各個事變底外貌以及各個事變底某些局部後果改變一個樣子，但這些特點終究不能改變事變底一般方向，因爲這種方向是由別種因素決定的。

(七)

除此而外，還要注意到如下一點。一般人講到偉大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時，差不多總是發生一種錯誤觀念。向讀者指出這種錯誤觀念，大概是不會沒有益處的吧。

拿破崙既担起了挽回社會秩序的「寶劍」使命，於是就排除了其餘一切將官擔負這種使命的機會，雖然這些將官中間也許有些人是能像他那樣或差不多像他那樣執行這種使命的。當社會要有一個堅毅軍事統治者的這種需要已獲得滿足時，社會的結構就堵截了其餘一切能幹軍人成爲軍事統治者的途徑。於是這種結構底力量就成了障礙其他能幹軍人表現其材能的力量。由此就有我們現在所說的那種錯誤觀念發生。因此一般人就未免極端誇大了拿破崙個人的力量，因爲他們竟把提出和支持了這種力量的全部社會力量通統歸到他一人份下去了。由是大家都覺得拿破崙個人的力量是個唯一無二的力量，因爲所有其餘與他相同的一切力量都沒有由可能變成爲現實。當人們聽說假如沒有拿破崙，那末情形就會不知怎樣的時候，於是人們的想像就混亂起來，竟以爲如果沒有拿破崙，就根本不會發生拿破崙個人力量和影響所憑藉的那種社會運動。

在人類智慧發展史中，因某一個人物獲得成功而使另一個人物不能獲得成功的情形，是要稀少得無比。但是人們在這方面也不能完全避免上述那種錯誤觀念。當一

定的社會局勢在其精神代表人物面前提出相當任務的時候，那末這些任務在英俊人物尚未把它們解決以前是始終引起英俊人物注意的。而當他們已能解決這種任務時，他們的視線就會轉注到另一種對象上去。當一個英俊人物A已把任務X解決時，於是英俊人物B就會離開這個已經解決的任務而去注意另一個任務，即注意任務Y。當你問到如果A還沒把任務X完成而就不幸死去，那末結果又會怎樣的時候，人們就會發生一種錯覺，以為社會智慧發展的綫索將因此中斷。殊不知A死去之後，這個任務是會由B或C與D去担任解決的，所以雖然A不幸早死了，但社會智慧發展的綫索依然是會完整無缺的。

爲了使一個擁有某種材能的人能運用他的這種材能來對事變進程發生重大影響，就需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他所具備的材能應比別人所具備的材能更適合當時社會的需要；如果拿破崙所具備的不是他那種軍事材能，而是彼多芬那樣的音樂材能，那他當然就會做不到皇帝。第二，當時社會制度不應阻礙具備有恰合當時需要並於當時有益的特性的那個人物施展其能力。如果法國舊制度再延續過七十五年之久，拿破崙也許終身也不過是個不大著名的包納泊特將軍或上校*。在一七八九年間，達武，達紫，馬爾蒙

*那時，拿破崙也許會像他在法國革命幾年以前所打算的那樣到俄國軍隊中去服務。如果他果真去了，他或許能在俄軍反對土耳其軍隊的戰鬥或反對高加索山民的戰鬥中顯一顯身手，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個地位微賤而頗有材能的軍官，在情況順利的時候能夠成爲世界霸主的。

和麥唐納還不過是少尉；伯納多特還只是個上士；何西，馬索，勒非甫耳，皮士格律，內依，馬森，繆拉，蘇爾特還是些軍曹；歐什洛還是個劍術教師；蘭恩還是個染匠；孫錫爾還是個戲子；茹爾丹還是個小販，別西爾還是個剃頭匠；布隆還是個排字匠；朱伯爾和朱諾還是法科學生，克雷貝爾還是個建築家；摩爾退直到革命發生時還沒在軍中服務*。

若是舊制度至今仍然存在，那末現在誰也不會想到前世紀末期法國會有過一些戲子，排字匠，剃頭匠，染匠，律師，小販和劍術教師，原來是些處於可能狀態的軍事幹材哩**。

斯騰達爾說，一個與梯齊阿諾同年，即一四七七年誕生的人，可以與拉斐爾（死於一五二〇年）以及達芬奇（死於一五一九年）同時度四十年的生活，他可以與一五三四年逝世的科列志以及一五六三年死去的米開蘭基羅同時生活很長一個時期，他當佐佐涅去世時還不過三十四歲，他能親眼看見廷托勒特，巴撒諾，味洛里則，羅曼諾和薩托等

* 見 *Histoire de France*, par V. Duruy, Paris 1893, t. II, pp. 524-525.

** 當路易十五在位時代，第三等級中只有塞維爾一人升擢到了中將銜。當路易十六在位時代，第三等級中人在軍中陞進的途徑更感困難了。見 *Rambeaud,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sixième édition, t. II, p. 226.

人；一句話說，他能做一切偉大畫家底同代人，不過看不見一百年後才出現的波倫亞學派中的人物*。同樣也可以說，一個與奧味曼同年誕生的人幾乎能親身同荷蘭所有一切偉大畫家相識**，而莎士比亞底同庚則可以和整整一羣卓絕戲劇作家同時生長***。

早已就有人說過，凡是有便於英俊人物發揮其材能的社會條件的時候和地方，總會有英俊人物出現的。這就是說，每一個真正顯出了本領的英俊人物，即每一個成了社會力量的英俊人物，都是社會關係底產物。但由此就可看出，英俊人物，正如我們所說過的，

* 見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 Paris 1892, pp. 24-25.

** 一六〇八年間誕生的有特爾保，布律厄，林布蘭；一六一〇年間誕生的有凡奧斯特，波特，波爾；一六一三年間誕生的有凡得赫爾斯特，施拉爾道；一六二〇年間誕生的有奧味曼；一六二一年間誕生的有維尼，克斯，厄味定根和拜納克爾；一六二四年間誕生的有伯爾格姆；一六二五年間誕生的有坡特爾；一六二六年間誕生的有楊斯騰；約於一六三〇年間誕生的有麥楚；一六三〇年間誕生的有留斯達爾；一六三七年間誕生的有凡得亥登；一六三八年間誕生的有和柏馬；一六三九年間誕生的有凡得維爾。

*** 「同時出現或相繼出現的莎比亞，彼蒙得，弗列特契爾，約翰孫，章伯斯特，馬幸澤，福耳德，彌得爾敦和黑武德等人便是一輩新起的人物，他們憑靠他們所處的那種方便的境遇而在前一輩人物所已預備好的土壤上繁盛滋長了起來」（見太納所著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1863, t. I, p. 468）。

只能改變當時事變底個別外貌，却不能改變當時事變底一般趨勢；他們自己是完全順應着這種趨勢出現的；沒有這種趨勢，他們是永遠也跨不過由可能進到現實的門階的。

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英俊人物。太納說得對：「當文明發展進程中新的進步產生出一種新的藝術時，總會有幾十個以一兩個天才人物為中心的英俊人物應運而生，幾十個英俊人物只能把社會思想表現出一半，而一兩個中心天才人物却能把這種思想完全表現出來」*。若是拉斐爾，米開蘭基羅和達芬奇在童年時期就被一些與意大利社會政治和精神發展進程沒有關係的機械原因或生理原因擊死了，意大利的藝術也許不會發展得那樣完備，但它在文藝復興時期發展的一般趨勢終究會同是那樣的。拉斐爾，米開蘭基羅和達芬奇並沒有創造出這種趨勢，他們自己不過是這種趨勢底優秀代表人物。固然，在一個聖才人物周圍通常有整個學派出現，並且他那些門徒總是努力把他的一切方法，甚至極細微的方法也都拿來運用，因此，拉斐爾，米開蘭基羅和達芬奇如果不幸早年去世，那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藝術由此所遭到的損失便會對其後來發展史中許多次要特點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只要當時意大利精神文明發展的一般進程中沒有某種一般原因引起某種大變更，那末這種藝術發展史實際上也是不會有什麼變更的。

*見太納所著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1863, t. II, p. 5.

不過，大家知道，數的區別歸根到底是會轉變爲質的區別的。既然到處都是如此，歷史上的情形當然也不能成爲例外。某一藝術潮流中如果有好幾個能夠成爲它的代表者的英俊人物都因時運不齊而相繼夭亡了，那末這一潮流也許始終不會有什麼出色的地方。但這種人物底夭亡是只有在此潮流不很深刻，以致不能提出一些新的英俊人物的場合，才會使其不能有相當的表現。可是，文藝中任何一個潮流底深度都要依它對於自身所代表其趣味的那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底意義，以及這個階級或階層底社會作用如何來決定，所以這裏的情形歸根到底也是要依社會發展進程和社會力量對比關係爲轉移的。

(八)

總之，領導人物底個人特點能決定各個歷史事變底局部外貌，所以我們所說的那種偶然成分在這種事變進程中始終表現着相當的作用，但這種進程底趨勢歸根到底要由所謂普遍原因來決定，即實際上是由生產力底發展以及依此種發展為轉移的社會經濟生產過程中的人們相互關係來決定。偶然現象以及著名人物個人的特點，其表現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顯著得無比。十八世紀的人們很少想到這些一般原因，却把歷史歸因於歷史人物底自覺舉動和情欲。當時哲學家認為歷史發展進程可以因受某些極細微原因影響而完全變更其方向，譬如說，由於某個統治人物腦子裏有某個「原子」作怪（這是自然體系一書裏屢次表示過的一種意見）（註二四）。

歷史學中新思潮的擁護者認為無論有怎樣的「原子」，歷史始終是只會循着它實際經過的那條路綫進展的。他們因極求強調一般原因底意義，竟把歷史人物個人特點底意義完全忽略過去了。照他們那樣說來，歷史事變彷彿絲毫也不會因能力大小不一人物的交替而有所變更*。我們既認為可以這樣假定，於是也就不免認定個人成分在歷史上根本

* 即是說，像他們那樣推論歷史事變規律性，就會要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來。而他們中間有些人在簡單記

沒·有·什·麼·作·用·，歷史上所有一切都歸因於一般原因底作用，都歸因於歷史發展一般規律底作用。這是走極端，是根本排斥相反觀點中所包含的那一部分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相反的觀點也就仍然保留有某種存在的根據。這兩種觀點間的衝突，表現成爲兩個相反命題互相對立的局面：一個命題是一般規律，另一命題是個人底活動。從後一命題方面來看，歷史不過是種種偶然現象底湊合；從前一命題方面來看，却會覺得甚至各個歷史事變底局部特點都是由一般法則底作用來決定。如果你認爲各個事變底局部特點都是由一般法則底作用所制約而與歷史人物底個別特性無關，那你就不要得出結論，說這種特點是由一般原因來決定，並且絲毫不會因歷史人物改變而有所改變。於是這個理論就變成爲宿命論。

反對這個理論的人們當然沒有放過它的這種弱點。聖畢大把米尼厄底歷史觀點比作波綏（註二五）底歷史觀點。波綏認爲決定歷史事變的力量是從上帝那裏來的，歷史事變是專供上帝表現其意旨的東西。米尼厄認爲這種力量就是人類的情欲，這種情欲在歷史事變中間是像自然界的力量那樣不可遏止一往直前地表現出來的。但他們雙方都把歷史看

述這種現象的時候，却甚至往往過分估計了個性底作用。但我們現在感覺興趣的不是他們所作的記述，而是他們所作的推論。

作是一些絕對必然如此發生的現象所構成的一串連環；他們兩人都是宿命論者；在這一點上，哲學家實在是與牧師相近(*le philosophe se rapproche du prêtre*)。

當社會現象規律性的學說還根本否認歷史上傑出人物底個別特點能對事變發生什麼影響時，這種責難本來是有相當理由的。而且這種責難本來應當引起很大的印象，因為新的歷史學派中的那些人也如十八世紀的史學家和哲學家一樣，認為人類天性是最高主體，所有歷史運動底一般原因都從這個主體中間發生，並且是服從於這個主體的。既然法國革命已經表明歷史事變不只是由人底自覺行為來決定，於是米尼厄，基佐以及屬於該派的其他學者就把往往不受意識所支配的情欲衝動提到了首位。既然說情欲是歷史事變底最後最一般的原因，那末聖畢夫為什麼又不能認定，說如果當時有一種人物能在法國人民中間激起一種與法國人民當時的情欲相反的情欲，則法國革命就會有其與實在結局相反的結局呢？米尼厄也許會要說：因為由於人類天性的關係，當時沒有其他情欲能激動法國人民。這種說法含有一部分真理。但這一部分真理帶有很鮮明的宿命論色彩，因為它無異是說人類歷史所有一切詳情細節都是由人類天性底一般屬性預決的。在此場合，宿命論就會是專門注重一般而抹煞個體的結果，並且始終都是這樣抹煞的結果。有人說道：「既然一切社會現象都是必然的，那末人們底活動都根本不能有什麼作用了」。這是對於正確意思的一種不正確的表述。本來應該說：如果說一切都是

一般原因所造成的結果，那末個別的成分——包括我的努力在內——就根本沒有什麼作用。這樣的結論本來正確，只是一班人把它運用得不正確罷了。用這種結論來評判現代唯物主義歷史觀是極不合理的，因為這個歷史觀對於個體作用也是予以承認的。但用這種結論去評判復辟時代法國史學家底觀點却是沒有根據的。

現在已經不能把人類天性當作歷史運動底終極的和最一般的原因看待了：如果說人類天性恆久不變，那它就不能解釋變化無窮的歷史進程；如果說它常有變化，那它的這種變化本身又是由歷史運動來決定的。現在應該把生產力發展情形看作人類歷史運動底終極和最一般的原因，人類社會關係方面的歷次變遷是由這種生產力決定的。除這種一般原因外，發生作用的還有一些特殊原因，即某個民族生產力發展進程所處的歷史環境，但這種歷史環境本身歸根到底又是由其他民族共同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即是由一般原因造成的。

末了，除特殊原因底影響而外，還有個別原因底作用，即社會活動家個人特點及其他「偶然性」底作用，因為有這些個別原因底作用，於是事變就具有其個別的外貌。個別的原因不能根本改變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底作用，而且個別原因影響底範圍和方向是由這種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所制約的。雖然如此，但如果影響了歷史的那些個別原因已被別種個別原因所替代，那末這個歷史無疑是會具有別一種外貌的。

莫諾和蘭普勒赫特兩人至今還是以人類天性爲立腳點。蘭普勒赫特硬說，並且再三再四聲言，說他認爲社會心理是歷史現象底根本原因。這是個嚴重的錯誤，正因爲有這樣一個錯誤，所以力求概括「全部社會生活總合」的那種本來值得嘉獎的志願，也就只能得出一種外表雖然美觀，但內容却完全空虛的折衷主義結論，或是得出——在那些推論得最澈底的人們那裏——像卡布里茨那樣一種妄談理性和感覺孰重孰輕的議論。

但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因爲他的個人特點使各個偉大歷史事變具有其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爲他自己所具備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於當時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社會需要。卡爾來（註二六）在其論英雄人物的名著中，把偉人稱呼爲發起人（*Beginners*）。這個名稱用得極其中肯。偉人確實是發起人，因爲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些，他的願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他把先前的社會理性發展進程所提出的緊急科學任務拿來加以解決；他把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所引起的新的社會需要指明出來；他擔負起滿足這種需要的發起責任。他是個英雄。其所以是個英雄，並不是說他能阻止或改變客觀自然事變進程，而是說他的活動是這個必然和不自覺進程底自覺自由的表現。他的作用全在於此，他的力量全在於此。但這是種莫大的作用，是種極大的力量。

俾斯麥嘗說，吾人不能創造歷史，而應該等候它自行造成。但歷史究竟是由誰造成

的呢？它是由社會人造成的，社會人是歷史底唯一「因素」。社會人自己造成自己的關係，即社會關係。但他在某一時期造成某種關係而不是造成別種關係，這當然不是沒有原因，而是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所制約的。沒有一個偉大人物能夠強迫社會去接受已經不適合於這種生產力狀況的關係，或是接受還不适合於這種狀況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確實不能創造歷史，所以他在這種場合移動他的錶針當然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他既不能把時間加速，也不能使時間倒退。蘭普勒赫特說得完全正確：俾斯麥在他威勢最高的時候也是不能把德國推轉到自然經濟時代去的。

社會關係有它自己的邏輯：當人們還處於某種相互關係時，他們的感覺、思維和行為也就一定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一個社會活動家要想反對這種邏輯，也會是徒勞無益的，因為自然的客觀事變行程（即這種社會關係邏輯）定會把他的一切努力化為烏有的。然而我如果知道社會關係因社會經濟生產過程中發生某種變化而朝着什麼方向變更，我也就會知道社會心理將朝着什麼方向變更，因此我就有可能影響這個心理了。影響社會心理，也就是影響歷史事變。可見，在相當意義上說，我畢竟能夠創造歷史，因此我也不必等候歷史去「自行造成」。

據莫諾底意見，歷史上真正重大事變和人物之所以重大，祇在於他們是社會機構和經濟條件發展底符號和象徵。這一意見頗為公允，不過表述得很不確切；但正因為這種

意見公允，所以決不可把偉大人物底活動同這種條件和機構底「緩慢變動」對立起來。「經濟條件」較爲緩慢的變更過程，到一定的時候就會使社會必然要較爲迅速地改造自己的機構。這種改造從來不是「自行」發生，而是始終需要由人們來干預的，因此人們擔負有偉大的社會任務。所謂偉大人物，也就是最能幫助解決這種任務的人物。解決任務，當然不能只算是任務解決的「象徵」和「符號」。

我們覺得，莫諾之所以竟把兩者對立起來，主要是因爲他爲「緩慢」這一愜意的字眼迷住了。這個字眼是很多現代進化論者所愛用的字眼。這種偏頗態度在心理上很容易解釋：它是必然要在那些崇尚溫和客氣的體面人們中間產生的。但它在邏輯上根本不值一駁，黑格爾早已就指出這點了。

並且不僅那些「發起人」，不僅那些「偉大」人物擁有大顯身手的廣大活動場所。凡是願用眼睛來看，願用耳朵來聽，願拿一顆誠摯的心來愛護親近的人，都擁有這種場所。「偉大」一語是個相對的概念。在道義方面說，每一個如聖經上所說願意「舍己救人」的人都是偉大的。

簡註

(註一) 卡布里茨(一八四八—一八九三)，係俄國民粹派作家。——見正文第五頁。

(註二) 所謂「可敬的社會學家」，是指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思想家尼·米海洛夫斯基而言。米海洛夫斯基讀到卡布里茨那篇文章後，馬上就在自己的一八七八年文藝隨筆中對它作過評判。——見正文第五頁。

(註三) 郎松(一八五七—一九三四)，係法國文學研究家兼文藝史學家。——見正文第七頁。

(註四) 史達木萊爾(一八五六年生)，係德國新康德派哲學家，否認歷史規律性。——見正文第九頁。

(註五) 拜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係俄國傑出的批評家兼政論家。——見正文第一頁。

(註六) 琴梅爾(一八五八—一九一八)，係德國唯心派的哲學家兼社會學家，崇尚康德思想。——見正文第一二頁。

(註七) 俄國主觀主義者是指拉福洛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夫等人而言。——見正文第一二頁。

(註八) 俄國「門徒」係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即社會民主黨人在合法刊物上為迷糊書報檢查局耳目而自稱的符號。——見正文第一三頁。

(註九) 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係戈果里所著中篇小說外套中的主人公，象徵着典型的小官僚。——見正文第一八頁。

(註一〇) 蘭普勒赫特(一八五六—一九一五)，係德國資產階級史學家，著有德意志史多卷。——見正文第二〇頁。

(註一一) 基佐，米尼厄和梯葉里，係法國復辟時代(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資產階級史學家。——見正

文第二五頁。

(註一二)章科是十八世紀前半期意大利哲學家兼史學家；孟德斯鳩是同時期法國社會學家；赫得爾是十八世紀後半期德國哲學家兼史學家。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企圖確定出歷史過程底規律性，認為歷史事變進程並不依帝王將相底意旨為轉移。據章科底意見，這種規律性就在於歷代國家興亡交替都是循着上帝所決定的永恆輪迴次序發生的。孟德斯鳩和赫得爾企圖把歷史規律性歸因於自然條件，主要是歸因於氣候和地理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見正文第二六頁。

(註一三)馬布里僧正(一七〇九—一七八五)，是法國的一個空想共產主義者，他認為帝王豪傑底活動是歷史變遷底基本原因。——見正文第二六頁。

(註一四)梯也爾(一七九七—一八七七)，係法國反動政治家，政論家兼史學家。殘酷鎮壓巴黎公社的事件就是由他組織的。——見正文第二七頁。

(註一五)聖嬰夫(一八〇四—一八六九)，係法國詩人兼文藝批評家。他認為個人底活動與社會條件無關。——見正文第二九頁。

(註一六)保拜都爾(一七二一—一七六四)，是法王路易十五底寵妃，在當時法國對內對外政策上起過頗大的作用。——見正文第三〇頁。

(註一七)布圖林伯爵(一六九四—一七六七)，是俄國大元帥，在七年戰爭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擔任過俄軍總指揮。——見正文第三二頁。

(註一八)蘇渥洛夫(一七三〇—一八〇〇)，係俄國傑出的統帥。——見正文第三二頁。

(註一九)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是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六被斬之日。——見正文第四一頁。

(註二〇)熱月的反動是在法國熱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反革命政變後造成的政治社會反動局面。熱月九日的政變推翻了小資產階級專政，並把小資產階級專政底領袖羅伯斯庇爾推倒斷頭台上斬決了。——見正文第四一頁。

(註二一)熱月，花月，草月，穡月，霧月等，是法國康文梯(國民公會)於一七九三年秋頒行的革命年曆月名。其所以如此稱呼，是要強調出革命勢力毅然決然與反革命天主教會破裂的事實。——見正文第四一頁。

(註二二)共和國八年霧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是拿破崙(巴納帕特)舉行政變之日。這次政變結果推翻了督政部，成立了執政府，隨後又成立了帝國。——見正文第四二頁。

(註二三)推勒里係巴黎城中法王故宮，後為拿破崙第一宮室所在地。——見正文第四三頁。

(註二四)自然體系是法國傑出唯物哲學家侯爾巴赫(一七二三—一七八九)底主要著作。——見正文第五〇頁。

(註二五)波綏主教(一六二七—一七〇四)，係法國哲學家兼著作家。——見正文第五一頁。

(註二六)卡爾來(一七九五—一八八一)，係英國資產階級著作家兼史學家。——見正文第五四頁。

45
0

 2/3